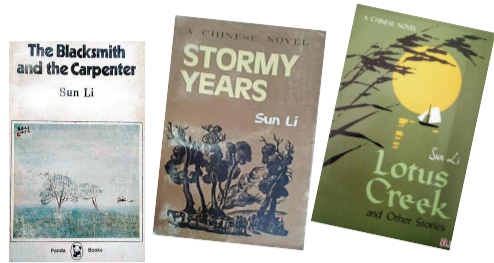


# 香远益清,历久弥新

——孙犁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

赵振杰



2023年,是孙犁先生逝世21周年。作为一位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创作生命长达60余年的重量级作家,孙犁及其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同时也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样本之一。目前,学界针对孙犁创作风格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但关于孙犁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除杨四平、刘卫东等人的零星几篇文章外,这一领域尚处于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笔者愿将已掌握的部分相关资料分享出来,以便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思路。

1944年6月,孙犁从晋察冀边区抵达延安,先是在鲁迅艺术学院做研究生,后担任教员,其间因创作《山里的春天》《杀楼》《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一跃成为解放区独具风格的青年革命作家。1946年,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被收入《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选》第一辑,成为“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上创作上具体实践的成果”(周扬语)之一。当时任晋察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周扬,准备赶往上海组织文艺界人士赴美访问。他带去的两件礼物中就有《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选》。后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访美计划遗憾未能成行。我们姑且将其视为孙犁作品走向海外前的一次“带妆彩排”。

1947年4月,孙犁的小说散文集《荷花淀》被编入《北方文丛》第二辑,由中国香港海洋书屋印行。其中,收录了孙犁在延安时期创作的6篇作品,即《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山地的春天》《麦收》。《北方文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周而复主编的一套左翼进步革命文学丛书,旨在向国内外读者介绍解放区文学作品。据说,当时《北方文丛》一经出版,便在香港和国统区文坛产生轰动效应,印行数字与日俱增,极大提升了工农兵文艺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成为进步人士了解共产党文艺路线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窗口。而《荷花淀》也因此成为孙犁文学作品中的“出海首秀”。

1951年10月,孙犁受邀参加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为了便于

苏联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作家,临行前,孙犁按组织要求撰写了个人自传。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访苏之行中,孙犁不仅随同参观了柴可夫斯基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等文艺圣地,同时还参加了中苏友好联欢会、乌兹别克诗歌节等多项文学交流活动,受到苏联作协方面的热情招待。这次苏联之行也标志着孙犁作品正式迈出国门,走向“世界”。1953年2月6日,王林在日记中明确写道:“一朝鲜青年翻译同志说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已译成日文出版。”由此可见,此时孙犁作品的翻译与推介工作已经启动,并在海外拥有一定的受众群体。

20世纪60年代初,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和传播迎来高峰期。中国外文局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推介中国文学艺术的官方刊物,行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951年10月《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后又创办了法文版)对孙犁的小说青睞有加。据刘卫东考证,在1961年至1966年间,《中国文学》先后出版发表了孙犁的《铁木前传》(1961年)、《孙犁小说选》(1964年)、《村歌》(1966年)等作品。其中,英籍汉学家、翻译家戴乃迭和编辑家兼评论家吕剑在孙犁作品的译介和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当

时正值盛年的戴乃迭曾将孙犁的多部作品译出,推荐给国外读者。《中国文学》相继刊载了她翻译的《山地回忆》《芦花荡》(1962年第9期)、《风云初记》片段(1963年第9期)、《光荣》(1965年第10期)等作品;1964年,吕剑的《孙犁会见记》在《中国文学》法文版1月号及英文版3月号上发表了文章以访谈随笔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孙犁的性情品质、创作风格、审美意趣、知识构成和思想来源,从而为海外读者勾勒出一个生动、鲜活、丰满的中国作家形象。此外,苏联的《文学报》还于1963年初译介了孙犁的《铁木前传》。王林曾在日记中称:“我已记不起告诉他(史如北,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苏联《文学报》译载了孙犁的《铁木前传》。想来,显然我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不然我就不会向他说这件事了。”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孙犁作品已经在海外传播中产生较大影响。

新时期以降,伴随着孙犁重返文坛,以及国内学界“孙犁研究”的中兴,停滞已久的孙犁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工作也再次开启。以马献廷的《我见到的孙犁——为〈中国文学〉而作》一文(《新港》1979年第10期)为前奏,《荷花淀》(1982年)、《孙犁小说选》(1982年)、《风云初记》英文版(1982年)、《风云初记》法文版(1983年)相继由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杂志社翻译出版。与此同时,海外

大到华北、东北。基于大德隆经营的成功,邸氏兄弟又投资了金融业和零售业,诸如大德源银号、德源金店、隆盛布庄、光裕布庄、华林绸布、百货商店等,逐步成为巨富。

但是,随着时局变幻,大德隆的命运无法避免地随着时局的动荡而起伏。20世纪30年代,军阀连年混战,各地工商业的产销环境恶化,大德隆也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其中。如民国十五年(1926),大德隆卷入天津国货售品所查封风波中。据1926年6月8日《直隶省长褚玉璞为直隶陆军督练公所派兵将国货售品所货运走变卖事指令津商会》中的附件《津商会呈(1926年5月31日)》,天津国货售品所在当年3月突然被查封,40家工厂(包括大德隆)的存货都被封在售品所里。事情的起因是李景林与冯玉祥的矛盾。1926年3月,冯玉祥率队退出天津,奉系军阀李景林入津。由于售品所总理宋则久与冯玉祥有旧,李景林构陷宋则久,并将天津国货售品所零售部查封,以此敲诈勒索。大德隆的销路受阻,遂与其他39家联名呈请,希望售品所查封。售品所被封门近百日。

同一时期,大德隆还面临着工人罢工的问题。据1929年9月25日《工人画报》中《提花工人的出路》一文,“昨天大德隆又要关厂,工人已提出了条件,不准资本家实行什么委员会又要调解,听说大德隆四百多工友,都不信他们,工友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回再不要上别人的当”。文章还提出“组织失业工人自救会”“不得关厂”“不得开除工友”“要求失业工友复工”“每天每人两个大子救济失业工友”“准备总罢工答复资本家的开除工友”等要求。与之相印证的《浩然正气贯长虹——李浩然烈士》一文,记载了出生在河北南宮市明化镇石家庄(村名,新中国成立后为避重名,改为石家莊)贫苦农民家庭的李浩然烈士,在十四五岁曾去天津大德隆织布厂当工人。后来因为参加罢工,被开除,返乡务农。

乱世中的大德隆,产销不可避免下降。根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的《天津市工业统计》,大德隆在民国十九年(1930)、二十年(1931)、二十一年(1932)的营业额依次递减,分别为280000元、220000元、180000元。此时,大德隆只有工人六十人。与开业之初的二三百人相较,从业人员规模大为缩减。从当时纺织技术不断提高的角度思考,工厂减员也有可能是因为技术提高所致。但是,大德隆实际上并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新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在日益恶化的生产和销售环境中,大德隆逐渐陷入困境。

据《天津创建提花织机的大德隆织布厂》介绍,大德隆于1942年歇业。四年以后,大德隆被出售。从1942年11月1日档案《会员工厂石碾用量调查表》来看,大德隆此时并未停工,染料坊和厨房做伙灶每月使用有烟原煤每月十吨(全部开工时的每月用量为二十二吨),取暖炉五个每月使用门头沟硬煤每月三吨(全部开工时的每月用量为九吨)。从这个数据来看,大德隆虽然惨淡经营,但并未完全停工。据此,大德隆或是在1942年底歇业,后被出售。1946年,大德隆在先夭不足、后天畸形和环境动荡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扼杀中走向消亡。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天津民族制造业史话”至此刊发完毕。下期开始刊发姜维群先生的系列文章“天津华洋说家具”。——编者

汉学家对孙犁的评价与研究也随之面貌一新。在法国汉学家林曼叔、海枫、程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4月版)中,孙犁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作家”。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逝世。“孙犁文学史定位与重估”问题很快成为海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与热议的话题。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渡边晴夫不仅于2000至2001年间先后发表了《孙犁的复活——从“文革”到再生》(《岱宗学刊》2000年第4期)、《“文革”前的孙犁——疾病的恢复与十年的创作空白》(《岱宗学刊》2001年第3期)两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并在2007年初专门以《中国文学史上对孙犁评价的变迁——与赵树理比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为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判。通过充分对比孙犁二人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教材中所占篇幅比例的寡厚,渡边晴夫总结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数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比重已经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不仅在文学史记载的量的方面,也涉及质的方面”,并且“在论述深度和评价高度上,孙犁都更胜一筹”。德国汉学家顾彬此时也在孙犁的评价态度上发生转变。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中认为,孙犁“写出了女性战友们‘美的心灵’”,不仅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之一”。

国内学术界素有“两个孙犁”之说。早期孙犁的小说清新似“荷”;晚年孙犁的散文从淡如“菊”。荷,花之君子者也;菊,花之隐逸者也。虽创作风格迥然有别,但文学价值却可等量齐观。然而,综合上所述,不难发现,在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上,明显存在着“老孙犁”有余而“新孙犁”不足的缺憾,以至于给许多海外读者带来一种认知上的错觉,即孙犁的创作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宣告终结。这种误解甚至影响到海外研究者对孙犁作品风格的整体性把握与判断。有鉴于此,出版界、翻译界急需将“衰年变法”后的孙犁作品纳入视野,从而为海外读者和学者呈现一个更为完整、立体的“孙犁”形象。

最后,谨以此文向孙犁先生表达最深切的追思与悼念。



迎风寄语燕一行(中国画)王鹏

## 黄永玉 与《瑟人病梅馆画意》

郑学富

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贺敬之文学馆珍藏着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一幅画《瑟人病梅馆画意》。画中几棵梅枝纠缠在一起,枝条形状各异,或曲,或直,或欹,或稠密,或稀疏。作者以墨的浓淡区分前后层次,遒劲有力,将梅枝的虬曲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梅花以没骨法描绘,用或浓或淡的红色随意点染,不求形似,而注重整体气氛的表现。梅花枝条繁茂,花朵饱满娇嫩,再加以枝干的点点绿意,充满勃勃生机的春天气息跃然纸上,为画面增添了无限活力。一位梳着长辮、身穿长袍的园丁,手持锄头,望着竞相怒放、千姿百态的红梅,充满了自信,或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修剪,让梅花盛开得更加灿烂。这幅画体现了黄永玉别具一格的画风,简洁、朴素、自然,用笔老辣干练,笔力雄劲,以书法笔意将梅花的枝干与花瓣串联起来,色彩鲜艳,尤其彰显了梅花的一身傲骨。画面上的大量留白,给观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题识“辛酉年春日为柯岩敬之嫂兄写瑟人病梅馆画意,黄永玉于三里河”。铃印两方:“永玉”“黄”,左下鈐闲章一枚。

有着“东方华尔街”之称的天津解放北路,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街道风貌。相当数量的西洋建筑在这里矗立百年,各放异彩而又相映生辉,是天津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样板和缩影。每步行至解放北路与赤峰道交口,一座装饰华丽、层次丰富的红白相间建筑,总能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细心观赏,这就是东方汇理银行旧址。这座建筑的点睛之笔,在于顶部三座精美绝伦的西洋古典式角亭,独具匠心。它的审美价值,由内至外,散发于建筑的每一个角落,让整条街道增添了超逸灵动之美,堪称建筑技艺的杰出范例。更为重要的是,在它结束银行职能之后,天津著名文化艺术机构进驻于此,继续向公众展示珍宝、传播艺术、普及美学。

东方汇理银行创办于1875年,由法国社会实业银行、巴黎商业银行、巴黎荷兰银行等多家银行联合组建,总行设在法国巴黎。它是法国在东方的殖民地银行,成立目的在于开拓印度支那和远东殖民地的贸易与金融业务。1885年,李鸿章作为清廷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并使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同年,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西贡设立远东总行。1899年、1907年分别在上海和天津设立分行,在华东业务主要为吸收存款、办理放款和贴现、经营国际汇兑和投资。民国初年,该行曾代表法国政府,与德、日、英、俄的银行组成五国银行团,对华签署了总计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后与北洋政府联合组建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前身),并获得了纸币发行权等财政经济特权。当时法国“租借”的广州湾(今广东省湛江市)的居民,称该行发行的货币为“安南纸”“西贡纸”。

东方汇理银行天津分行大楼建于1912年,由比商义品公司按照该行法国巴黎总部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建造。此楼主体占地近似“L”型,主入口设在解放北路,东北方向

## 东方汇理银行旧址: 华丽转身成为艺术殿堂



罗丹



为内院。建筑为三层平顶砖木结构,基座为天然石材砌筑,首层为水泥仿石块面层,做横向线条处理。门窗为拱形样式,上方有山花或券心石。主入口外凸,顶部雨棚与二层窗台结合,并由左右两根具有爱奥尼克风格的立柱支撑。内装黑色铁艺镂空大门,镶嵌彩色玻璃。一层以上为清水红砖墙与混水墙面搭配,墙面装饰有抹灰纹样。二层窗户两侧用牛腿支撑三层阳台,女儿墙带有宝瓶式栏杆。方形壁柱由楼底直抵檐顶,突出了立面的垂直划分。建筑风格稳重大方、细节丰富、造型多变,采用了明显的折衷主义形式。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建筑顶部三座极具特色的亭子被震毁拆除。在广大市民的期盼中,在2009年的历史风貌建筑整修工程中,角亭作为恢复建筑历史构件的专项修复整修内容,终于获得新生。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资料,在角亭外檐粘贴与清水红砖墙装饰效果相同的面砖,顶部做瓦屋面、檐口粘贴装饰线,重现了建筑本来的艺术风采。角亭的点缀,让端庄的建筑秀丽非凡。它的各角度照片,也常被当作解放北路的网络游览攻略封面来展示。

天津解放后,经中国银行核准,东方汇理银行天津分行于1949年6月2日成为经营外汇的指定银行。结业清算后的1956年10月,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分出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筹备处,在东方汇理银行原址举办了历代绘画、天津地方民间艺术等展览的试展。这座精美的大楼开始华丽转身,成为艺术殿堂。1957年12月10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幕,本身亦是收藏家、鉴赏家的副市长周叔弢等百余人参加了开幕仪式。建馆时全馆馆藏文物艺术品一千多件,分为古代艺术品和地方民间工艺美术品两部分展出。古代艺术品有陶瓷、铜器、玉器、书画和文物艺术品,代表展品有钧窑洗、汝窑盆、乾隆年间玉扁壶及翡翠白菜。地方民间工艺美术品代表作有自清代至现代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第一代至第四代的彩塑泥人、“刻砖刘”“风筝魏”等知名匠人的各式作品,以及天津美术地毯等。

这座银行旧址,曾经展出过不计其数的稀世珍宝。天津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文物之一范宽的绢本水墨画《雪景寒林图》,初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叔诚捐献。一同捐献的包括历代书画、写经、玉器、铜器、碑帖等共计四百余件,其中宋元明清各代书画多为稀世珍宝,如边鲁《起居平安图》、钱选《花鸟卷》、赵孟頫《洛神图》、仇英《桃源仙境图》、恽寿平《瓊香馆写生册》等。1981年3月,“周叔弢、张叔诚同志捐献文物图书展览”在艺术博物馆举办。作为最引人注目的《雪景寒林图》,在陈列大厅一层重点展出。从那时起,隐于前景树干的“巨范宽制”四字楷书款,就开始让观展的文物艺术爱好者们在重峦叠嶂、寒林漠漠的画作中耐心寻觅与探究。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在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度过近四十年的时光,1995年5月迁至不远处承德的法国公议局旧址。1998年,天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成立,并于当年举办了首届天津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从此,这座建筑又被称为“国拍大楼”。2007年7月,西洋美术馆在此成立,开始举办中外美术展览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为天津以展示西洋美术艺术品为主的场所。六十多年来这里虽然几经变迁,但文艺的气息从未远离。

今天,当人们走入这座恢宏典雅的艺术殿堂,在水晶吊灯与红木地板的映衬下,墙壁上那一幅幅精美的画作仿佛流动的音符,轻轻鸣奏着沉迷百年的悠扬旋律。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扫一扫,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 《小楼春秋》解说词:

整栋楼是一个砖木三层的结构,从立面形式上呈现了非常典型的古典主义的三段式。半地下室这个墙面是用这个天然的石材来砌筑的;首层采用了水泥抹面,再加上横向线条的处理;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个门窗,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和手法,整个屋顶的部分是采用整体的平屋顶,出檐比较小,女儿墙用了这种宝瓶式的装饰栏杆,在屋顶的地方增加了这个坡屋顶的亭子,这样也使得整个建筑的体量看起来更加挺拔,同时,建筑的轮廓也变得加生动和优美。

1949年天津解放后,英、美等国银行相继歇业,东方汇理银行被指定经营外汇,1957年1月正式歇业,结束了该行在天津60年的经营历史,成为天津最后关闭的一家外资银行。(节选)

春日为柯岩敬之嫂兄写瑟人病梅馆画意,黄永玉于三里河”。铃印两方:“永玉”“黄”,左下鈐闲章一枚。

《瑟人病梅馆画意》是专为贺敬之、柯岩夫妇所作,创作于1981年春天。1953年,贺敬之与柯岩结婚,被称为“诗坛伉俪”,相濡以沫,珠联璧合。1977年,贺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2月,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创作和落实政策工作。黄永玉此时赠画贺敬之,或是借龚自珍《病梅馆记》一文的意义,借古喻今。龚自珍(字瑟人)的散文《病梅馆记》采用小品文样式,运用以梅喻人,借题发挥、托梅议政的曲笔,透过植梅、养梅、疗梅的生活琐事,由小见大,1981年,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人们纷纷冲破思想领域的藩篱禁锢,迸发出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黄永玉援古证今,托物言志,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体现了画家对贺敬之恢复工作后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正本清源、推动文艺繁荣的由衷赞叹,也寄予了深深的期冀。时至今日,观者仍能从中受到感染和鼓舞。